# 賀川豐彥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劉家峰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 一、前言

作為十九世紀在歐洲興起的社會新思潮，「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首次出現是在一八五〇年的英國，莫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拉德洛（John Malcolm Ludlow）等人編輯的小叢書用了這個名稱。他們主張把基督教的社會原則運用到現代工業組織中，以合作社方式改造社會組織和生產制度。此後，基督教社會主義作為社會兼宗教運動在歐美展開，興衰起伏長達一個多世紀。[1]

但基督教社會主義新思潮並沒有跟隨歐美傳教士來華而同步在中國傳播，早期來華傳教士多以「拯救個人靈魂」為第一要務，對以改良社會為主旨的新思潮興趣不大。此後，由於美國傳教士帶來的社會福音神學的影響，教會內有關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討論才多了起來。[2]但在二十世紀

1. 關於基督教社會主義史的研究，可參閱 John C. Cort, *Christian Socialism: An Informal History*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8)。
2. "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in Kiangyin", *The Chinese Recorder* 44.4 (April 1913), pp. 255-256。潘慎文，〈基督教性質與社會主義並非絕然反對說〉，載《興華報》卷十第三十六冊（1913）；Y. Y. Tsu, "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The Chinese Recorder* 47.3 (March 1916), pp. 169-172。

初期，包括基督教社會主義在內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多以日本為橋樑輸入中國知識界。日本知識界接受社會主義思潮要比中國早很多，而且，基督教在日本早期社會主義運動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早期的社會主義運動領袖多是基督徒，如村井知至、安部磯雄、片山潛、幸德秋水、木下尚江等，都是日本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先驅。村井知至的《社會主義》、西川光次郎的《社會黨》、福井準造的《近世社會主義》等著作一九〇二年在上海翻譯出版，對中國人了解社會主義幫助很大。[3]

真正把基督教社會主義傳入中國並在教會內外產生一定影響的當屬賀川豐彥（1888-1960）。很少有人像賀川豐彥一樣擁有如此多的頭銜：牧師、佈道家、勞工領袖、作家、詩人、學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等等，這些頭銜昭示了他驚人的才華及貢獻。在上世紀三〇年代，他曾被冠以「日本的甘地」、「日本的聖方濟」、「日本的史懷哲」、「日本的托爾斯泰」等名號，被公認為「最具世界知名度的日本人」。賀川豐彥在一九五五年曾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堪稱是日本近現代史上的一位巨人。[4]本文將討論賀川豐彥基督教社會主義在中國如何傳播、有何影響及其意義。

3. 楊衛華，〈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以教外知識分子為中心的考察〉，載《世界宗教研究》2014 年第 1 期，頁 125。

4. 關於賀川豐彥的傳記很多，早期多是美國傳教士和日本同事撰寫，如 William Axling, *Kagawa*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2)；黑田四郎著，邱信典譯，《賀川豐彥傳》（台北：人光出版社，1990）。學術性傳記見 Robert Schildgen, *Toyohiko Kagawa: Apostle of Love and Social Justice* (Berkeley, CA: Centenary Books, 1988)，中文譯本見施爾德根著，劉家峰、劉莉譯，《賀川豐彥：愛與社會正義的使徒》（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研究賀川豐彥的書目可參閱米沢和一郎編《賀川豐彥 II》（東京：紀伊國屋書店，2006）。有關「賀川豐彥與中國」的最新研究，可參看金丸裕一，〈賀川豐彥の中国〉，載《キリスト教文化》2016 年春季卷，頁 39-54；〈中国における賀川豊彦評価をめぐつて——1920 年から 1949 年の事例研究〉，載《立命館経済学》卷六十五第 6 号（2017），頁 189-208。筆者亦曾撰文〈賀川豐彥與中國〉，載《東亞文化交涉研究別冊》6（2010），頁 45-60。

## 一、賀川早期經歷與其基督教社會主義理念的初步形成

賀川幼年失去父母，從小在缺乏關愛的環境中長大，十一歲時得叔父資助進城念中學，寄宿在一位基督徒老師家中，由此接觸到基督教，並遇見了改變他一生命運的兩位美國南長老會傳教士。在傳教士的引導下，賀川不顧叔父反對，於一九〇四年二月受洗。一九〇五年賀川中學畢業後入明治學院神學預科，結業後轉學到神戶神學院。賀川模仿彼得和保羅，在課餘時間到貧民窟街頭佈道。一九〇九年平安夜，二十一歲的賀川決定把基督教信仰付諸行動，住進神戶的一個貧民窟，與酒鬼、賭徒、殺人犯、傳染病人等為鄰，從此他開啟了在貧民窟的佈道、教育、醫療等事業，直到一九一四年去美國讀書。他把這五年的經歷融入自傳體小說《越過死亡線》，一九二〇年出版後引起轟動。賀川在貧民窟的這段經歷，成為他一生偉大事業的起點，不僅塑造了他犧牲、奉獻與服務的美好形象，也讓他成為一位具有超級魅力的社會領袖。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間，賀川在普林斯頓主修心理學，免修神學必修課，因而有大量時間選修胚胎學、遺傳學和古生物學等，增強了對進化論的理解。一九一六年五月畢業後曾去紐約調查貧民窟，也打過工，本打算繼續到芝加哥求學，由於經費短缺和健康不佳，他決定回國。這一時期正是美國勞工運動最盛的時期，他目睹了紐約六萬工人的示威遊行，感受到了工人團結的巨大力量，增強了返回日本後推動工人運動的決心。

一九一七年五月，賀川從美國回到神戶貧民窟。這時他改變了以往以救濟為主的工作策略，轉向組織勞工運動。其直接動因是他對貧民窟的研究和在美國的所見所聞。他確信貧窮的根源在於經濟體制自身，除非改變整個

的政治和工業體制，無論何種的慈善形式，個人的慈善或英雄行為永遠不會根除貧窮，救濟僅是權宜之舉。他組織工會，通過政治行動喚醒整個社會，因為只有這樣，基督徒才能把基督教義付諸實踐，他因此成為一個行動主義的牧師。他在文章和公眾演講中公開提倡工人權利，批評資本家和政府，呼籲勞工聯合起來成立工會。一九一九年四月，關西勞動同盟會在大阪成立，賀川親自擔任理事長，他起草的成立宣言明確要求生存權和勞動權，要求八小時工作制和最低工資立法。這是日本的第一個工會組織，曾多次領導工人運動，包括一九二一年川崎和三菱船廠工人罷工。因在城市的勞工運動受挫，賀川又把目光轉向農村，組織農會和農工政黨。在經歷了多年貧民窟生涯和充滿複雜鬥爭的勞工運動之後，賀川逐步走向成熟，成為日本著名的社會運動家，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

賀川在一九二二年前並沒有關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系統論述，但其核心觀念在這一時期已初步形成。早在中學時期，他就從社會主義者安部磯雄與木下尚江的著作中了解到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歷史。[5]在明治學院期間，他開始留意馬克思的著作。他贊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以及對資本主義問題的分析、對工人階級的愛，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根源，以及資本主義造成戰爭、阻礙人類進步的觀點。他甚至很樂觀也很幼稚地預測：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很快就會滅亡。[6]他在從事勞工運動期間，閱讀了大量西方社會主義者的著作，深受英國合作社組織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Guild socialists）和費邊主義者（Fabians）的思想影響，認同「工廠歸工人

5. 河島幸夫，《賀川豊彦の生涯と思想》（福岡：中川書店發行，2007），頁 16。
6. 施爾德根著，劉家峰、劉莉譯，《賀川豐彥》，頁 22-23。

所有並由工人管理」的理念，工人擁有產業的所有權，形式如基爾特社會主義一樣。他認為「社會主義和勞工運動在本質上有相同目標，那就是勞動管理權」。[7]為此，他反對激進派、暴力革命的做法，反對俄國布爾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主張組織工會、實行普選和議會改革，並因此受到其他勞工運動派別的反對，甚至遭到政府的監視和逮捕。

在二〇年代，賀川因為服務貧民窟和領導勞工運動而名聲大振，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注意，其著作陸續被譯介到國內。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北京的《晨報》連載了賀川的文章，他以「唯心的經濟史觀」來批評馬克思唯物史觀，但文章沒有署他的名。[8]以倡導基爾特社會主義為宗旨的上海期刊《解放與改造》在一九二〇年六月刊載了賀川的論文〈勞動全酬權論〉。所謂「勞動全酬權」，即奧地利法學家門格爾（Anton Menger，原文寫作「安通梅伽」）提出的「十足勞動收入權」（每一個勞動者對他的個人勞動收入的權利）。[9]門格爾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在法學上的根本權利，且只能在「共有私用之社會主義之時代方能實現」。[10]賀川用「唯心史觀」補充論證了應在社會化的經濟組織中實現這一權利，並應注重工人的生命價值和文化價值。該文還評論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認為剩餘價值並非僅僅資本家依個人動機而產生，也是因為社會組織有

7. "Mr. Kagawa of Kobe: A Christian Laborites" *Japan Weekly Chronical*, May 26, 1921, p. 732。轉引自施爾德根著，劉家峰、劉莉譯，《賀川豐彥》，頁 79。
8. 原題是〈唯心的經濟史觀の意義〉，載《改造》一九一九年七月號，頁 41-52；《晨報》發表時題目改為〈馬氏唯物史觀的批評〉（1919 年 7 月 25 日-8 月 5 日），《民國日報》副刊《覺悟》轉載（1919 年 7 月 31 日-8 月 9 日）。
9. 賀川豐彥原文收錄在其著作《主観経済の原理》（福永書店，1920），頁 307-333。門格爾的原著見 Anton Menger, *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Stuttgart, 1886)。恩格斯曾撰文批評該著，見恩格斯，〈法學社會主義〉，載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卷二十一，頁 545-568。
10. 賀川豐彥著，明權譯，〈勞動全酬權論〉，載《解放與改造》卷二第十一期（1920 年 6 月），頁 51。

缺陷，而資本家利用了這種缺陷，是一種社會經濟病理現象。[11]這些觀念成為以後賀川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

一九二一年，《東方雜誌》發表了他的長文〈社會主義與進化論之關係〉。日本社會主義者高畠素之曾著《社會主義與進化論》一書，賀川對此有不同的認識。賀川認為「社會主義不可不立其基礎於社會進化的原理之上」，即「從自由意志發生之歷史而研究至自由意志活躍之範圍」，並標明他所信奉的進化原理已經從達爾文主義過度到「布格遜主義」（即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創造進化論」）。[12]他指出，把生物進化論與社會進化學說混同會帶來危險，尤其是達爾文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法則，人類社會本不該如此，道德家和宗教家一直守着這個要塞。賀川批評馬克思學派的唯物社會主義只注重「境遇之改善」，只用階級爭鬥與革命手段來改造社會，單講「唯物的改造」而忽視倫理與精神生活，「笑宗教漠視哲學」。[13]當時正值社會主義和進化論思潮在中國盛行，文章提醒了中國知識界關注社會主義與進化論之間的複雜關係。

一九二〇年八月，應上海日僑基督教青年會和內山完造邀請，賀川首次來華，擔任第一回「夏季自由大學講座講師」，講座和早禱會連續進行五天，講題有「耶穌與社會問題」等。期間，賀川還調查了上海的貧民窟。這讓陳獨秀非常感動，他稱讚賀川是「一位有良心的學者」，希望中國勞工領袖注意他的言論。[14]賀川也有機會與孫中山見面會談。

11. 同上，頁 54-55。
12. 賀川豐彥著，陳嘉異譯，〈社會主義與進化論之關係〉，載《東方雜誌》卷十八第 9 號（1921），頁 51。
13. 同上，頁 61-62。
14. 陳獨秀，《獨秀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卷二，頁 101。

一九二二年四月，賀川應邀到清華大學參加世界基督徒學生大會，並與胡適會面，討論了信仰問題。《民國日報》介紹他是「日本有名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這可能是中文報章首次以「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稱呼賀川。胡適說他不信神，賀川反問胡適「所謂神，究竟是甚麼？是超越的，像藏在自然底彼岸的法則等類的東西嗎？那樣的東西，不是我所信着的」。他向胡適解釋，他所信仰的神就是「生命」，「『生命』超越了自己，又在自己之中內住着生命者，就是指在我底內面想、哭、笑的東西。『生命』是人格，又看去好像超越着人格的。我底所謂神，除窺入直觀的世界的這『生命』以外，沒有別種東西。我底所謂絕對，就是說『生命』」。[15]可惜沒有更多資料可以顯示，胡適是否理解了賀川的解釋。

賀川在他的個人雜誌《雲之柱》創刊號（1922 年 1 月）上發表〈懷念基督教社會主義〉，闡明他的立場「既不是唯靈的，也不是唯物的，而是基於生命主義之上」。接着他這樣解釋生命主義：「生命在追求的方面表現為理想主義，作為追求理想的精神生活是唯心的。然而，由於生命又存在於物質和空間的關係中，它要經營物質生活。在這點上，生命受到物質規律的束縛。只是，這種物質規律，不像馬克思所認為的那樣是絕對的。……工人運動也好，改造運動也好，由於也是改造物質生活本身，真實的生命可生存之道才得到發現，而不以物質為衣裳的精靈生活卻一無所有，其中豈不是只剩下空虛的生命嗎？在這裏，我將發現化身的真理。……基督教社會主義，將永遠在這種化身的福音中發現真理。因為在上之物化身為在下之物、

15. 丐尊，〈賀川豐彥氏在中國的印象〉，載《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2 年 7 月 14 日），第 1 版。

富有成為貧窮、知識階級成為工人階級、靈成為肉身，並且，上帝甚至化身為人，基督教社會主義是徹底完成從世界的謬誤中獲取解放的運動所得到的東西。」[16]

賀川這裏提到的「化身的福音」，是指「應當在物質的意義上表現愛，倡導上流階級應當主動為了下層階級而犧牲的人格主義運動」。[17]在他眼中，耶穌就是一位「木匠」，他的信仰就是「基於對這位工人本然的愛的道德及其愛的上帝的發現」。[18]上帝化身在名為耶穌的肉身之中，所謂「神人合一」，這是賀川關於耶穌的宗教體驗。

賀川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領導參與勞工運動，其動力主要來自作為一名基督徒的使命感。他對基督教的理解並非神學院所學的那套，而是屬於「自由派基督教」的系統。他吸收了歐美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的概念，同馬克思學派的唯物論進行論辯，在勞工運動中逐步形成了他關於勞動權、人格權、生命價值的觀點，形成了他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基本立場。這一時期他僅有幾篇文章被介紹給國人，但由於用了一些新名詞，譯文佶屈聱牙，他的思想恐怕很難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正確理解。五年之後賀川再次來華，情形則大不一樣，他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闡釋就清晰、通暢而且系統多了。

## 二、從「愛的運動」到「友愛的合作經濟學」

城鄉貧困一直是中國新教教會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成立以後，專門組建了負責經濟問

16. 譯文轉引自倉橋克人，〈「大正民主運動」與賀川豐彥〉，載楊熙楠、鈴木正三編，查常平譯，《現代社會轉型中的天皇制和基督教》（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頁128-129。
17. 同上，頁126。
18. 同上，頁123。

題的部門（早期叫「教會與工業委員會」，後更名為「基督化經濟關係委員會」），嘗試用基督教的方法來尋求解決之道。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至二十八日，協進會在上海召開「基督化經濟關係全國大會」。賀川在日本教會和勞動界的聲望和經驗，使他成為大會最理想的主講人。在這次會上，賀川有兩次正式演講，六次早晨半小時靈修，參加了有關工業、農村經濟等議題的討論。據當時報道，賀川「以演講和激動人心的評論和批評為大會定調」；「他確信以實踐主耶穌的生活方式就一定能解決生存問題，並把這一信念灌輸給與會代表」。[19]

賀川在題為「教會與經濟問題」的演講中聲明，他研究經濟的方法不同於正統派的政治經濟學，也不用馬克思的理論工具（唯物史觀），而是更重視政治經濟的心理學，認為用生命、勞動、人格來做分析工具，要比用物品、機器和資本更重要。他用基督徒的眼光來研究人類的天性，發現基督教已有很久的「友愛」運動和光榮的社會制度，如一世紀的基爾特制度（Guild system），中世紀充滿基督徒理想主義的工業基爾特等。賀川從《使徒行傳》第二和第四章中還找到了基督教很早就有「共產」制度的證據，[20]以此來證明「共產」算不得新事物。

基督教如何才能改造經濟？賀川從教會內外兩個方面給出了答案。從教內來看，他認為教會制度甚不完備，尤其是教會宗派林立，不能團結一體，也就無法組織一個堅固的社會。他說教會不是「擇優」，乃是「友愛」，因此首先要在教會內組織友誼社，要有合作團體，如同中世紀各行各業的基爾特（行會組織），實行博愛互助的精神，

19. The Editor, "Christianizing China's Economic Life", *The Chinese Recorder* 58.10 (October 1927), pp. 639-640.
20.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編，《基督化經濟關係全國大會報告》（上海，1927），頁 32-33。

而不要暴力革命，因為革命仍不能解決人的問題與欲望。在教會以外，他根據在日本的實踐經驗，建議組織「合作社、工會、勞工黨及勞工學校」，任何人都可以參加。[21]他在關於「日本社會運動」的演講中，特別提到了要提防唯物主義者羅素與馬克思的信徒，因為他在大阪組織的農民協會差點被從莫斯科回來的青年赤化了。[22]賀川的結論是要解決經濟問題，必須「用最高的標準教導人民」，必須「發揚基督的人格，參與各種的制度」，努力奮鬥才能建設一個良好社會。[23]

以上是賀川帶給大會的主要信息。雖然他當時並沒把這些觀點歸納為「基督教社會主義」，但他面對上海教會領袖演講時，卻毫不猶豫稱自己是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最初我是一個抱社會主義的人，不是物質的是靈性的社會主義者。因為要改造社會必須有社會的原則，那就是社會主義。我是一個基督徒社會主義者，雖然，在日本，他們很不喜歡這名稱的。」[24]大會之後印行的《賀川豐彥評傳》，書名副題用了「日本基督教社會主義者」。[25]一九二八年三月，賀川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論》中文版在上海發行，[26]該著作對前述論點做了較為系統的闡述。

一般認為基督教社會主義是從十九世紀英國開始的運動，但賀川認為「木匠耶穌之運動在根本上已是一種改造運動」，是從「人性之內部徹底改造人生」，教人們拋棄所有權，教富人變賣一切所有分給窮人，教人們去救濟苦

21. 同上，頁 33-34。
22. 同上，頁 39。
23. 同上，頁 34。
24. 〈賀川豐彥生平事業的自述〉，載《工業改造》第 15 期（1927 年 12 月），頁 11。
25. 邢德著，陳其田譯，《賀川豐彥評傳》（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1928）。
26. 賀川豐彥著，阮有秋譯，《基督教社會主義論》（上海：太平洋書店，1928）。原作收錄在大宅壯一編的《社會問題講座》第十一卷（東京：新潮社，1927）。該書縮寫版亦發表在《青年進步》第 115 期（1928 年 9 月）。

惱的人，因此，「耶穌在世的時候他的門徒就開始了共產運動」。[27]他反對人們把基督教和社會主義分開來看：認為基督教是個人主義的東西，只有唯物的社會主義才是社會的。他從耶穌的精神和耶穌之後的基督教各種運動來分析，認定基督教是「一種以愛為基礎的偉大的社會運動」；「這是一種以救拔生理的心理的道德的虛弱者為職志的偉大的愛之運動，這是永遠的生命的運動，是天國之運動，是『愛之社會』主義運動」。賀川不相信唯物史觀，只相信唯心的道德史觀，相信生命價值說、勞動價值說和人格價值說，反對商品主義和機械的奴隸制度，「以愛為基調而改造法律和政治」，而不是進行階級鬥爭。[28]這是賀川《基督教社會主義論》一書的要旨。

賀川的人生觀和社會觀都是圍繞一個「愛」字，他深信「基督之愛」才是解決世界各種問題的寶筏，因此他不贊成武力政策，始終反對馬克思學說和工人暴動。他說：「我喜歡『共產主義』這名詞，但很可惜馬克思派包辦了這四個字……物質上的有無相通，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方面。我們應當再進一步。如果我們實行登山寶訓，那就是真的共產主義——人道的共產主義。『給』的共產主義，不是『搶』的共產主義」。[29]賀川認為在工業界，「逐漸改革、循序日進比革命還好」，所以他只贊成罷工，反對暴動，屢次與日本左傾的工會脫離關係，甚至有損勞工運動的統一，也在所不惜。[30]

一九二八年賀川在日本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神國運動」（Kingdom of God Movement），目標是引領一百萬人皈

27. 賀川豐彥著，阮有秋譯，《基督教社會主義論》，頁 4-6。
28. 同上，頁 49-50。
29. 邢德著，陳其田譯，《賀川豐彥評傳》，頁 15-16。
30. 同上，頁 16。

主。一些在華傳教士都認為「神國運動」值得中國教會仿效。[31]此後，協進會發起了「五年運動」，目標是基督徒人數翻一番。因此，隨後幾年裏，賀川又多次受邀來華訪問、指導。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六至八月四日，中華基督教會在杭州開會，請賀川來講「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日本社會運動與基督教的關係」。他強調上帝、聖靈在社會改造中的地位：「上帝是真正社會民主的基礎」，「不但要讓我們的心靈經歷聖靈，讓乞丐和流浪者的心靈也經歷聖靈」；「我很急切看到社會改造，不是因為我是一名社會主義者，而是因為我是一名基督徒」；「沒有上帝，勞工運動不再美麗，那只是一場鬥爭」。[32]中華基督教會總幹事高伯蘭（A. P. Kepler）曾這樣總結賀川思想的特徵：倫理上的神秘主義、社會化的個人主義和奉獻的共產主義。[33]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三至二月十七日，賀川又一次來華訪問。他在滬江大學的講演題目分別為「基督教與社會秩序」、「十字架與社會」和「城市問題」，主題圍繞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問題。賀川深知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在中國的影響日益加深，覺得有必要讓中國信徒理解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的關係。他認為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工人階級被資本剝削方面是正確的，然而，「馬克思主義僅僅是做病理學研究」，並沒有給出未來社會重組、重建的方案。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是一件好事，因為在十九世紀基督教忘掉了為窮人服務的事業，「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十字架的意義，如果我們踐行了耶穌的十字架，也許就不再需要馬克思主義」。基督教對社會重

31. Editorial, "Mr. Kagawa's Mess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60.8 (August 1929), p. 480.
32. A. P. Kepler, "The General Workers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61.9 (September 1930), p. 548.
33. 同上。

建軟弱無力，賀川認為根本原因是「教會內部缺乏互助」，為此，他極力倡導友愛運動（brotherhood movement），認為「共產主義運動不過是基督教友愛運動的結果」。[34]

賀川所謂的「友愛運動」並非只是表達倫理、情感上的「兄弟之愛」，而是指通過組織各種實用的合作社來發展經濟，改造社會。賀川豐彥早在一九〇五年通過石川三四郎的《合作社的故事》了解了關於合作的知識，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創辦的勞動教育和消費合作社也讓他印象深刻。他從一九一二年開始嘗試創辦合作食堂，以後還辦過旅館、商店、生產、銷售、信用、醫療等多種合作社，積累了豐富經驗。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〇年，他不間斷地在日本各地演說、推廣合作社，並受邀到美國、亞洲、歐洲做巡迴演講，其聲望在西方達到了高峰。他潛心研究合作社的哲學觀和具體操作方法，出版了十二本關於合作社的書，[35]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友愛的合作經濟學》。

該著是一九三六年賀川在紐約科爾蓋特－羅徹斯特神學院（Colgate-Rochester Divinity School）的講稿，原題是「基督教的友愛和經濟改造」（Christian Brotherhood and Economic Reconstruction），成書後改為更簡潔的《友愛的合作經濟學》（*Brotherhood Economics*）。[36]賀川在書中首先指出，現代基督教宣講的福音已不能滿足人類整個生活的需要，因此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就興起來了。馬克思共產主義促使基督徒覺醒，走上基督教會真實使命的道路，也就是合作社的道路，「基督徒必須提倡全世界之友愛運動，

34. Toyohiko Kagawa, "The Cross and Society", *The Chinese Recorder* 62.4 (April 1931), pp. 217-218; "The City Problem", *The Chinese Recorder* 62.5 (May 1931), p. 291.
35. 施爾德根著，劉家峰、劉莉譯，《賀川豐彥》，頁 130-131。
36. Toyohiko Kagawa, *Brotherhood Economic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6).

而以有效之行為，實踐仁愛，藉以應付此種無上挑戰」。[37]

如同論證基督教社會主義從使徒時代就存在一樣，賀川認為歷代基督徒也不乏友愛互助的精神，而且這種友愛精神中包含着經濟行為，即當基督教信仰以友愛做見證的時候，財產權和遺產權的問題往往是以共產主義的方式去解決，合作運動就可以成功。因此合作事業也是一種「友愛的精神運動」。[38]他在書中詳細列舉了當下應創辦的七種合作事業，即保險合作、生產合作、市場合作、信用合作、互助合作、公用事業合作、消費合作。他認為這七種合作社就是七種友愛的方法，可以基本滿足人們生產生活的需要，還免除了剝削。[39]賀川試圖從基督教的觀念出發，把當下競爭性的經濟系統改變成為合作性的，從而改善整個社會。

此外，賀川還提出了創設「合作性的國家」以及「國際合作社」的藍圖。為使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成效，他建議用友愛的原則建設合作性的國家，然後在經濟合作的基礎上，再聯合組成聯邦國家。聯邦設立兩院，分別是工業議院和社會議院，再設立一個內閣。[40]建立國際合作社是為了解決當下的戰爭衝突，實現國際和平。他認為經濟問題仍是影響和平的主要因素，因此，必須擴張合作運動，使得它國際化，「等到赦罪的愛心在十字架上表現出來，滲透國際的經濟，合作運動的友愛實現了，世界的和平就可以來到。」[41]

賀川倡導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強調是「愛的運動」，再到「友愛的合作經濟學」，恰好說明了他的基

37. 賀川豐彥著，許無愁、程伯群譯，《友愛的合作經濟學》（上海：廣學會，1940），頁 3。
38. 同上，頁 73、85。
39. 同上，頁 91。
40. 同上，頁 116。
41. 同上，頁 146。

督教社會主義論是以「愛」作為根本，通過合作運動來實踐愛，讓基督化的合作運動成為最好的福音，這是賀川把基督教社會主義從理念變成現實的路徑，他甚至認為這是獲取世界和平的唯一可行方法，儘管他設想的合作社國家和聯邦有太多烏托邦的意味。

## 三、賀川基督教社會主義論在中國的影響與意義

自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以後，賀川不僅在日本和西方聲譽日隆，在中國也極受尊崇。高伯蘭稱讚他是「訪問中國的最偉大的人物之一」。[42]也有傳教士把賀川與甘地、孫中山並列稱為「現代東方的三位哲人」。[43]據胡適日記，美國教授桑德斯（Kenneth Saunders）把胡適、甘地、賀川豐彥、晏陽初並稱「東方四傑」。[44]協進會總幹事誠靜怡稱賀川為「基督教界鉅子」，「實心實力之社會改造專家」。[45]隨着賀川頻頻來華訪問、演講，他至少有六本著作譯成中文出版，他寫的文章和寫他的文章、報道不少於二百篇（據不完整統計）在教會報刊發表。很多青年信徒和學生聽了賀川講演，更是興奮不已。無疑，賀川在二〇、三〇年代是閃耀在中國教會上空的一顆巨星。

然而，賀川和他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究竟對教會產生了怎樣的實質性影響？結出了怎樣的果實？如果拋開上述這些讚美賀川的文字，回到中國教會的歷史實際進行考察，不難看出，賀川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論對中

42. Kepler, "The General Workers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pp. 546-547.
43. Paul G. Hayes, "Wise Men from the Modern East", *The Chinese Recorder* 64.12 (December 1933), p. 770.
44.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六冊（1930-1933）（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頁 330-331。參見 Kenneth Saunders, *Whither Asia? A Study of Three Leader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3)，書中介紹了甘地、胡適和賀川豐彥三人。
45. 賀川豐彥著，季理斐、谷雲階譯，《賀川豐彥證道談》（上海：廣學會，1929），〈誠序〉。

國教會的影響不宜高估，或者說影響是比較有限的，尤其是它不曾像在日本取得實質性的成績，造福數百萬平民。在三〇年代轟轟烈烈的中國基督教鄉村建設運動中，各地曾有少量的銷售、生產、信用合作社的實驗，有一些成效，但整體而言，無論是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還是中華基督教會，從沒有認真制定政策或計劃，把賀川在勞工運動和合作社領域的思想通過教會付諸實踐。

對此，我們大致可以從外部環境和內在因素兩個方面解釋。所謂外部環境，主要是指賀川基督教社會主義論所針對的是類似日、美已發展起來的工業社會，而勞工運動與合作社也是在法制較為健全的環境下才能發揮作用，而二〇、三〇年代中國的工業和城市發展跟日本比落後太多，加上日本對華的侵略戰爭，中國面臨的主要矛盾與日本大不一樣。民國時期的合作運動或是為實行三民主義而採取的一種社會經濟政策，或是為超越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而選擇的一條中間道路。[46]這與賀川倡導的友愛互助精神的合作運動有實質性的差異。

所謂內在因素，是指教會內並不認同賀川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的信徒大有人在，只是主流教會（以協進會為代表）中的社會福音派遮蔽了質疑者的聲音。即使教會內研究、鼓吹社會主義用力最甚的張仕章，讀了賀川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論》之後，也批評賀川把「基督教社會主義」說得太廣泛了，把「基督教共產主義」連在一起講了。張仕章認為基督教社會主義只是「限於特殊時代中的特殊地方之運動」，英國在一八四八年以後發生的「基督教社會

46. 詳見卜國群，〈中國三十年代的合作運動及鄉村改良潮〉，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4期，頁124-136。

主義」只是一種生產合作運動或社會改良政策。[47]他認為自己創設的以「中國革命」為主旨的「耶穌主義」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是改造中國急需的思想。[48]

儘管賀川每次宣講福音時都能以「簡樸動人」的信息打動人心，是公認的傑出佈道家，但如同很多日本信徒認為賀川的宗教性不夠一樣，一些中國信徒也如此認為。[49]當時頗受歡迎的佈道家宋尚節曾被視作「中國的賀川豐彥」，但其神學立場與賀川迥異。一九三一年一月他們同被邀請到滬江大學演講，宋尚節不滿賀川所講的社會福音，自知其講演主旨也不合現代派聽眾的口味，沒有講完便自告引退。[50]即使服膺基督教社會主義、對賀川佩服到「五體投地」的年輕人，但也是「唱高調的多，真正到鄉間的少」，缺乏實幹精神，無法把基督教社會主義落到實處。因此，有人質疑「中華的賀川豐彥」又到哪裏尋呢！[51]

另外，賀川在戰爭期間表現出複雜的兩面性，即「講英語的賀川」與「講日語的賀川」，對外展示了兩個不同的賀川形象，一個是「和平使者」，一個是「戰爭協作者」。[52]很少有中國信徒在戰前、戰時察覺到這一點，大部分人都被賀川對中國人的流淚告白而感動。一九四六年《天風》轉載了美國一位記者的文章，文章嚴厲批評賀川「已經沒落」，放棄了自由主義，配合政府的極端國家主義，附和

47. 張仕章，〈介紹《基督教社會主義論》〉，載《野聲》卷 1 第 3 期（1928 年 11 月），頁 72-75。
48. 詳見劉家峰，〈調適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張仕章及其耶穌主義理論初探〉，載王成勉編，《十字架前的思索——文本解讀與經典詮釋》（台北：黎明文化，2010），頁 237-258。
49. Editorial, "Mr. Kagawa's Message", p. 480.
50. 劉翼淩，《宋尚節傳》（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95），頁 330。
51. 蔣翼振，〈我所欽佩的東方偉人之一——賀川豐彥〉，載《明燈》第 160、161 期合刊（1930），頁 413-414。
52. 詳細見金丸裕一，〈賀川豐彥の中国〉。

共榮說，是個假唯愛主義者，「政治上的落伍者」。[53]這樣的批評發表在協進會的機關報上，也讓中國信徒多少會減少對他的信任和好感。或許《天風》為了平衡觀點，很快又發表了一篇為賀川辯護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在日本的美國傳教士。他認為賀川今日仍是日本基督教與社會民主的重要力量；賀川並非超人，他在戰時沒有做到他可能做的，但並非他一人如此；賀川的政治主張是社會民主黨，要求以民主方法實現溫和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作者認為今天賀川與以往一樣，還是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54]

職是之故，賀川在中國所極力提倡的勞工運動和合作運動並沒有如願發展起來。追隨賀川的中國信徒們也大多停留在文字上的鼓吹或口頭宣傳基督教社會主義，有思想上的共鳴，欣賞和讚美賀川，卻無效仿賀川的行動決心，因此沒有結出看得見的實果。但這也並不意味着賀川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在中國基督教思想史上沒有意義。

毫無疑問，賀川在基督教世界是一位英雄，同時也是一位充滿爭議的複雜人物。因為他熱衷於組織社會運動，有人說他是或接近「赤色分子」，或批評他宗教性不夠，保守教會甚至說他是「魔鬼」。[55]這樣的評價顯然不夠公正。日本著名宗教哲學家中島重在一九三六年曾批評一般外國人「對賀川的欣賞是很膚淺的」，大部分外國人加入賀川教會，並沒有理解他及其教會與眾不同的根本原因：「他的思想不是基於耶穌倫理教義之上的人道主義的社會福音。它是從人類團結一致中生長出來的精神力量。其中心

53. 丁休，〈沒落了的賀川豐彥（上）〉，《天風》49（1946 年 11 月），頁 11。丁休，〈沒落了的賀川豐彥（下）〉，載《天風》50（1946 年 12 月），頁 12。原文發表在一九四六年四月的 *Christian Register*.
54. 勃魯鮑，〈賀川豐彥——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載《天風》59（1947 年 2 月），頁 11-12。
55. 黑田四郎著，邱信典譯，《賀川豐彥傳》，頁 173。

是在社會和個人都展示出來的上帝對人類的救贖之愛。他相信人類通過社會化程序來適應上帝之國。通過這個方法，他追求為社會主義提供一種有神論的學理基礎，正如馬克思用唯物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礎。」[56]

作為與賀川同時代的神學家，中島重對賀川設身處地的理解要比一般人深刻多了。這也為我們再思賀川豐彥基督教社會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意義提供了新的視角。上世紀二〇、三〇年代，當中國教會竭力尋求基督教改造社會的良方時，賀川適時出現在中國人面前，用他的思想與實踐為中國教會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方案。以基督教或社會主義的方式來理解當下社會，在聖經的思考框架中，嘗試提出一套先知式的解決方案，這對今天的我們依然是個難題，賀川和他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論的價值與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關鍵詞**：賀川豐彥　基督教社會主義　友愛主義
合作運動

作者電郵地址：jiafengliu@126.com

56. Thomas T. Winbun, "Kagawa Examined"，載《真理與生命》卷十第 3 期（1936 年 5 月），頁 4。

## 中文書目

丁休。〈沒落了的賀川豐彥（上）〉。《天風》49（1946 年 11 月）。頁 11。[DING Xiu. "Mo luo le de he chuan feng yan (shang)". *Tian Feng* 49 (November, 1946). p. 11.]

——。〈沒落了的賀川豐彥（下）〉。載《天風》50（1946 年 12 月）。頁 12。[DING Xiu. "Mo luo le de he chuan feng yan (xia)". *Tian Feng* 50 (December, 1946). p. 12.]

卜國群。〈中國三十年代的合作運動及鄉村改良潮〉。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頁 124-136。[BU Guoqun. "Zhong guo san shi nian dai de he zuo yun dong ji xiang cun gai liang chao".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1994 issue 4. pp. 124-136.]

丏尊。〈賀川豐彥氏在中國的印象〉。載《民國日報》附刊《覺悟》（1922 年 7 月 14 日）。第 1 版。[Mian Zun. "He chuan feng yan zai zhong guo de yin xiang". *Juewu. Supplement to The Publican Daily News,* July 14, 1922. p. 1.]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編。《基督化經濟關係全國大會報告》。上海，1927。[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Ji du hua jing ji guan xi quan guo da hui bao gao*. Shanghai, 1927.]

邢德。《賀川豐彥評傳》。陳其田譯。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1928。[XING De. *He chuan feng yan ping zhuan*. Translated by CHEN Qitian. Shanghai: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1928.]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第六冊（1930-1933）。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HU Shi. Hu shi ri ji quan ji. vol. 6 (1930-1933). Edited by CAO Boyan. Hefei: Anhu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1.]

施爾德根。《賀川豐彥：愛與社會正義的使徒》。劉家峰、劉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Schildgen, Robert. *Toyohiko Kagawa: Apostle of Love and Social Justice*. Translated by LIU Jiafeng & LIU Li.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ress, 2009.]

勃魯鮑。〈賀川豐彥——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載《天風》59（1947

年 2 月）。頁 11-12。[BO Lubao. “He chuan feng yan: ji du jiao she hui zhu yi zhe”. *Tian Feng* 59 (1947). pp. 11-12.]

恩格斯。〈法學社會主義〉。載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卷二十一，頁 545-568。[Engels, Friedrich. “Fa xue she hui zhu yi”. In *Ma ke si en ge si quan ji*. Compilated and translat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Department for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5. Vol. 21, pp. 545-568.]

陳獨秀。《獨秀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卷二。[CHEN Du Xiu. *Chen du xiu wen cun*. Shanghai: Oriental Book Company, 1922. Vol. 2.]

張仕章。〈介紹《基督教社會主義論》〉。載《野聲》卷一第 3 期（1928 年 11 月）。頁 72-75。[ZHANG Shizhang (Hottinger S. C. Chang). “Jie shao ji du jiao she hui zhu yi lun”. *Ye Sheng*, vol. 1 issue 3 (November 1928). pp. 72-75.]

賀川豐彥。〈唯心的經濟史觀の意義〉。載《改造》一九一九年七月號。頁 41-52。[Kagawa, Toyohiko. “Wei xin de jing ji shi guan zhi yi yi”. *Gai Zao*, July 1919. pp.41-52.]

——。〈馬氏唯物史觀的批評〉。《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19 年 7 月 31 日-8 月 9 日）。[Kagawa, Toyohiko. “Ma shi wei wu shi guan de pi ping”. *Jue Wu. Supplement to The Publican Daily News*, July 31-August 9, 1919.]

——。〈勞動全酬權論〉。明權譯。載《解放與改造》卷二第十一期（1920 年 6 月）。頁 50-62。[Kagawa, Toyohiko. “Lao dong quan chou quan lun”. Translated by MING Quan. *The Emanci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vol. 2, issue 21 (June 1920). pp. 50-62.]

——。〈社會主義與進化論之關係〉。陳嘉異譯。載《東方雜誌》卷十八第 9 號（1921）。頁 50-63。[Kagawa, Toyohiko. “She hui zhu yi yu jin hua lun zhi guan xi”. Translated by CHEN Jiaxu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vol. 18, issue 9 (1921). pp. 50-63.

——。〈賀川豐彥生平事業的自述〉。載《工業改造》第 15 期（1927 年 12 月）。頁 9-12。[Kagawa, Toyohiko. "He chuan feng yan sheng ping shi ye de zi shu". *Gong Ye Gai Zao* 15 (December 1927). pp. 9-12.]

——。《基督教社會主義論》。阮有秋譯。上海：太平洋書店，1928。[Kagawa, Toyohiko. *Ji du jiao she hui zhu yi lun*. Translated by RUAN Youqiu. Shanghai: Tai ping yang shu dian, 1928.]

——。《賀川豐彥證道談》。季理斐、谷雲階譯。上海：廣學會，1929。[Kagawa, Toyohiko. *He chuan feng yan zheng dao tan*. Translated by JI Lifei & GU Yunjie.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29.]

——。《友愛的合作經濟學》。許無愁、程伯群譯。上海：廣學會，1940。[Kagawa, Toyohiko. *You ai de he zuo jing ji xue*. Translated by XU Wuchou & CHENG Boqun.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40.]

黑田四郎。《賀川豐彥傳》。邱信典譯。台北：人光出版社，1990。[Kuroda, Shirō. *He chuan feng zhuan*. Translated by QIU Xindian. Taipei: Ren guang chu ban she, 1990.]

楊熙楠、鈴木正三編。《現代社會轉型中的天皇制和基督教》。查常平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YEUNG, Daniel, & Susuki Shozo, eds. *Emperor Syste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Modern Society*. Translated by ZHA Changping.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7.]

楊衛華。〈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以教外知識分子為中心的考察〉。載《世界宗教研究》2014 年第 1 期。頁 124-132。[YANG Weihua. "Ji du jiao she hui zhu yi zai jin dai zhong guo de chuan bo: yi jiao wai zhi shi fen zi wei zhong xin de kao cha".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2014 issue 1. pp. 124-132.]

劉家峰。〈賀川豐彥與中國〉。《東亞文化交涉研究別冊》6（2010）。頁 45-60。[LIU Jiafeng. "Toyohiko Kagawa and China".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Supplemental* 6 (2010). pp. 45-60.]

——。〈調適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張仕章及其耶穌主義理論初探〉。載王成勉編。《十字架前的思索——文本解讀與經典詮釋》。台北：黎明文化，2010。頁 237-258。[LIU Jiafeng. "Tiao shi ji du jiao yu she hui zhu yi: Zhang Shizhang ji qi ye su zhu yi li lun chu tan". In *Shi zi jia qian de si suo: wen ben jie du yu jing dian quan shi*. Edited by WANG Chengmian. Taipei: Li Mi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2010.]

潘慎文。〈基督教性質與社會主義並非絕然反對說〉。載《興華報》卷十第三十六冊（1913）。頁 2-4。[PAN Shenwen. "Ji du jiao xing zhi yu she hui zhu yi bing fei jue ran fan dui shuo". *Xīng Hua Bao* (*Chinese Christian Advocate)*, vol. 10 issue 36 (1913). pp. 2-4.]

蔣翼振。〈我所欽佩的東方偉人之一——賀川豐彥〉。載《明燈》第 160、161 期合刊（1930）。頁 413-414。[JIANG Yizhen. "Wo suo jing pei de dong fang wei ren zhi yi: he chuan feng yan". *Ming Deng* 160/161 (1930). pp. 413-414.]

劉翼凌。《宋尚節傳》。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95。[LIU Yilin. *Life of John Sung*. Hong Kong: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Ltd, 1995.]

## 外文書目

米沢和一郎編。《賀川豐彥 II》。東京：紀伊國屋書店，2006。[Yonezawa, Waichiro ed. *Toyohiko Kagawa* II. Tokyo: Kinokuniya Company Ltd., 2006.]

金丸裕一，〈賀川豐彥の中国〉。載《キリスト教文化》2016 年春季卷。頁 39-54。[Kanemaru, Yūichi. "Kagawa Toyohiko no Chūgoku". Kirisutokyō bunka. Spring 2016. pp.39-54.]

——。〈中国における賀川豐彥評価をめぐつて——1920 年から 1949 年の事例研究〉。載《立命館経済学》卷六十五第 6 号（2017）。頁 189-208。[Kanamaru, Yuichi. "Chūgoku ni okeru Kagawa Toyohiko Hyōka o megutsute — 1920-nen kara

1949-nen no jirei kenkyū". *Ritsumeikan keizai-gaku*, vol. 65 issue 6 (2017). pp. 189-208.]

河島幸夫。《賀川豊彦の生涯と思想》。福岡：中川書店發行，2007。[Kawashima, Sachio. *Life and Thoughts of Toyohiko Kagawa*. Fukuoka: Nakagawa Shoten, 2007.]

賀川豐彥。《主観経済の原理》。東京：福永書店，1920。[Kagawa, Toyohiko. *Shukan keizai no genri*. Tokyo: Fukunaga Shoten, 1920.]

Axling, William. *Kagawa*.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2.

Cort, John C. *Christian Socialism: An Informal History*.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8.

"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in Kiangyin". *The Chinese Recorder* 44.4 (April 1913). pp. 255-256.

Editor. "Christianizing China's Economic Life". *The Chinese Recorder* 58.10 (October 1927). pp. 639-640.

Editorial. "Mr. Kagawa's Mess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60.8 (August 1929). p. 480.

Hayes, Paul G. "Wise Men from the Modern East". *The Chinese Recorder* 64.12 (December 1933). pp.767-773.

Kagawa, Toyohiko. *Brotherhood Economic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6.

___. "The Cross and Society". *The Chinese Recorder* 62.4 (April 1931). pp. 217-218.

___. "The City Problem". *The Chinese Recorder* 62.5 (May 1931). pp.290-295.

Kepler, A. R. "The General Workers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61.9 (September 1930). pp. 545-550.

Menger, Anton. *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Stuttgart, 1886.

Saunders, Kenneth. *Whither Asia? A Study of Three Leader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3.

Tsu, Y. Y. "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The Chinese Recorder* 47.3 (March 1916). pp. 169-172.

Winbun, Thomas T. "Kagawa Examined"。載《真理與生命》卷十第 3 期（1936 年 5 月）。頁 1-4。[Winbun, Thomas T. "Kagawa Examined". Zhen Li Yu Sheng Ming, vol. 10 issue 3 (May 1936). pp. 1-4.]

#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Toyohiko Kagawa and his Christian Socialism in Modern China

LIU Jiafeng
Professor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oyohiko Kagawa, was one of the most preeminent Japanese social reformers and Christian leader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had a good reputation in the Chinese church from the 1920's onward. He was frequently invited to visit China, and lectur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NCC) or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CCC) meetings when he visited. His preaching focused on Christian Socialism, which emphasized "the movement of love", and did not agreed with Marxism, and especially Marx's ideas of violent class struggle. He proposed "brotherhood economics" as a tool for social change. For example, building economic cooperatives, as an alternative to both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is also a part of this peace movement. His ideas were widely publicized

through the circulation of his books, articles and lectures in the Chinese church circles, and were received as a social gospel by many Chinese Christians.

However, Kagawa's Christian socialism, especially his ideas concerning the labor movement and brotherhood economics, were not practiced in China. Although in contrast, these ideas benefited millions in Japan. Factors both outside and inside of the Chinese church can explain this. The economic and legal situation in modern China did not allow the church to take a leading role. Above all, many Christians, as well as church leaders, could not identify Kagawa's ideas with their own needs. Neither NCC nor CCC had a strategy or detailed plans for practicing these ideas. This does not mean Kagawa's Christian socialism has no significance in modern China. At the very least, it provided an alternative way for the Chinese church to reform society in a Christian way.

**Keywords:** Toyohiko Kagawa; Christian Socialism; Brotherhood; Cooperative Movement